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

陈继勇^{1,2}, 李知睿^{※3,4}

(1.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2; 3.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2; 4. 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索尔维经济与管理学院,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050)

摘要: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经济结构失衡且增长乏力、自然环境破坏加剧和宗教民族冲突肆虐等问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面临政治、经济、文明与宗教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 政府、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企业三方应该实现联动, 加强对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 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和互利共赢。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地缘政治; 防范;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8)12-0010-0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12.002

China's Risks and Preven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HEN Jiyong^{1,2}, LI Zhirui^{3,4}

(1.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Institute of US and Canada Econom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4. Solvay Brussels School Economics & Management,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Brussels 1050, Belgium)

Abstrac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ll fac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ivilized and relig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turmoil, imbalanced economic structure,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deteriorated natural environment damage and rampant religious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speed up the "going out" policy,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urance and service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realize linkage,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of direct investment risks, and promot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situ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risks; geopolitics; prevention;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缓慢^[1], 《世界投资报告2018》预计2018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长5%左右, 仍将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而同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 下同)却大幅增长, 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 583亿美元, 虽然较2016年的1 962亿美元同比下降19.3%^[2], 仍是10年前522亿美元的3倍多,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

对外直接投资国^[3]。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出访中亚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由理念化为行动, 由愿景化为现实。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

收稿时间: 2018-04-21; 修回时间: 2018-09-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39); 国家留学基金及武汉大学研究生出国(境)交流项目

作者简介: 陈继勇(1953—), 男, 湖北应城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E-mail: cjhubei@163.com。

※通讯作者: 李知睿(1990—), 男, 湖南长沙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E-mail: zhirui@ulb.ac.be。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进一步推动该倡议由顶层设计转向具体推进务实合作阶段。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今后将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通过搭建更多投融资促进平台,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鼓励更多社会资金合规有序投入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与能源等开发性项目建设,推动构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4]。

五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整体呈较快发展趋势,投资潜力日益显现。2013—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由126.3亿美元增至201.7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超过800亿美元。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共在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113个,累计投资348.7亿美元,入区企业4542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8.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8.7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5年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曾达到189.3亿美元的高位,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2016年伊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承压下行,投资金额骤降至153.4亿美元,降幅高达23.4%,投资金额占总额的7.8%。中国近两年来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非理性直接投资行为实施了严厉打击和监管,非理性直接投资的领域被清楚界定并且写进法规^①,明确列入中国《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领域。2017年,在非理性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企稳回升,较2016年大幅攀升31.5%至201.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7%^[2]。短期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态势;长期来看,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国可获得巨大的地缘政治与战略资源,从而以“向西开放,加快西出”的方式间接绕开美、日“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围堵。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仍面临诸多风险,值得高度重视并加以防范^[5]。

1 投资风险分析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不断致力于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投资金额和投资范围逐年飞速增长和扩大,遍布沿线国家多个产业领域,在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契机^[6]。然而,机遇的背后向来暗含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明与宗教特点千差万别^[7],又存在着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经济结构失衡且增长乏力、自然环境破坏加剧和宗教文明冲突肆虐等诸多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风险管理人才与经验缺乏的现实难题,不断遭受来自以上国家政治、经济、文明与宗教等风险的侵扰,导致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否可持续发展并收获投资效益产生担忧情绪。

1.1 政治风险

1.1.1 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和布局,不仅牵涉中国以及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还涉及到部分大国(如美、日、俄、印等)的战略利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意在遏制中国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有效对冲美国“印太战略”;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造成冲击;印度担忧“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将使其通过联合阿富汗制约巴基斯坦的计划付之东流^[8]。由此可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频现大国博弈的身影,多元力量在此交织,其目的早已超出争夺商业利益的范畴,美、日、俄、印等大国频频介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竞相争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主导权。然而,中国历来秉承“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域外大国博弈的干扰,甚至某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国均衡,利益均沾”的策略都将给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的地缘政治安全隐患。

1.1.2 外部政治风险

如果投资的东道国与中国关系良好,自然会向中国企业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如果中国投资

^①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信部、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理性直接投资的解释,主要是近年部分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直接投资为名进行的转移资产行为。

的东道国与美国或者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纠纷,难免会面临后者在经济等领域的制裁,从而对中国企业在此地区的投资构成威胁,如俄罗斯近年来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有直接的冲突,所以后者掀起了对前者的新一轮经济制裁。此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战略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日益成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支柱,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局势复杂变化,一些域外国家甚至通过炒作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竟判菲律宾“胜诉”,这无疑加重了该地区内的紧张局势,难免会波及到中国的投资安全^[9]。

1.1.3 东道国政局动荡风险

政局稳定对于吸引国际投资以及加强经贸合作是必需的前提条件。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政治生态脆弱,国家的稳定团结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强制力和政治强人。因此,新政府的上台或者领导人的更迭往往是诱发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2015年1月,希腊新政府组建的当天就宣布暂停中国中远集团投资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2015年1月,印度对斯里兰卡总统大选进行干涉,阻止了亲华领导人拉贾帕克萨上台,同年3月,新政府一上台就决定暂停了由中国交建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10]。因此,东道国政局动荡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政治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1.1.4 东道国政府干预风险

无论东道国进行的是非区别性政府干预,还是区别性政府干预,都会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风险。非区别性政府干预虽无针对性,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例如,东道国政府制定有利于本国税收的转移价格政策,要求中国境外企业的管理人员由其本国居民担任,要求中国境外企业使用一定比例的当地原材料和零部件等,都将给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运营活动造成影响。区别性政府干预带有针对性,干预程度较为严厉。只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合资的形式进行投资,且所占股权比例较小;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支付一些额外费用;制定某些歧视外商企业的法律;鼓励外资企业的工人进行罢工等^[11]。很显然,这些区别性政府干预的内容会直接加大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经营难度。

1.1.5 市场准入风险

市场准入风险指东道国以法律的形式对外资进入的行业、规模以及其他条件加以限制的风险。例如,菲律宾对外资管制较为严格,分别对外公布其禁止类和限制类外资行业清单,另外有关法律同时规定基础设施工程的承包商必须具有公用事业特许证,且菲方控股应在60%以上。这些门槛条件的存在势必增加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入成本和营运风险。

1.2 经济风险

1.2.1 宏观经济风险

一般来讲,东道国宏观经济状况越良好,投资收益越有保障。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东盟为例,2018年东盟整体经济增速达到5.2%^[12],与2017年基本持平,相比2013—2016年约4.9%的平均增速有趋稳向好势头,经济下行压力一定程度上得到消减。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四大贸易伙伴的中美两国,2017年东盟对两国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20%^[13]。然而,中美两国自2017年8月14日至今一直陷于贸易战的纷争^①,这显然对马来西亚、泰国等严重依赖美国、中国、日本等外部市场的贸易导向型经济体构成极大冲击^[14],带来的不利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不振和私人消费需求萎靡,这也必然降低本地市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1.2.2 东道国债务违约风险

“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耗资巨大,资金问题尤为突出。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在2017年2月2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基建投资不足的国家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遭遇瓶颈并且就业增长乏力的现象,预计2016—2030年期间亚洲地区总共需要约26万亿美元基建项目支出^[15]。此外,据同日援引亚开行说法的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称,中国目前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已经达到预计所需水平的90%以上,而亚洲每年约1.7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支出总额中,中国占近一半,长期下来可能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16]。“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其投融资环境不及欧美与中国,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短期内前景不容乐观,且部分直接投资极有可能沦为呆账、坏账,面临来自被投资国的债

①普遍认可的中美贸易战起始时间为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正式对华开展301调查。

务违约风险^[17]。

1.2.3 东道国货币贬值与汇率风险

2015年以来,随着经济复苏,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随之进入加息周期,而欧央行和日本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状态。为防范经济危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依赖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加息预期加剧了沿线各国本币贬值的潜在压力,64个沿线国家中除中国以外,都存在较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尤以独联体国家为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发布的《汇率安排和汇兑限制 2014 年度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汇率安排以固定汇率或稳定汇率机制为主。例如,保加利亚和波黑货币采用以欧元为发行保障的货币局制度;海合会五国、约旦、黎巴嫩等严格盯住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老挝、克罗地亚等采用类似爬行安排的汇率机制;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汇率管制^[18]。这样的汇率机制僵化,缺乏灵活性,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与汇率风险^[19-20]。

1.2.4 产业投资结构风险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产能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由产业结构不均衡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也日益影响着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领域比较集中,名列前五位的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以上五个领域合计占到直接投资额的70%以上^[21]。这些行业领域具有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易受东道国国内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投资环境、资源潜力、环境约束等风险要素以及与中国政治关系综合影响等特点^[22],一旦东道国政府认定中国对以上产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危及其国家经济安全而叫停相关产业投资项目,将造成境外中资企业巨额损失。“一带一路”倡议“六廊”建设规划中的“中巴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和“中缅经济走廊”(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CMEC)这两个经济走廊因其投资东道国均与中国政治关系较好,产业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今后中国可更多使用这两条战略经济走廊,以降低投资风险,确保产业投资效益。

1.2.5 环境规制的风险

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2017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486 家样本企业中投资第二产业的占75%,其中又以能源、矿业、制造、基建等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历史问题使得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加之缺乏有效的生态环境监督和保护机制,导致中国“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生产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规制风险更为巨大^[23]。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奉行的赶超战略和沿袭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中国对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约束力不够,这导致境外企业在经营决策、成本核算、属地化战略选择等多个环节均缺少环境风险评估。另外,部分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由于事后处理与赔偿不及时,易被政治势力裹挟利用,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污染转移论”等负面舆论,间接引导东道国政府对其采取环境规制手段。2014年3月,中国在秘鲁最大的投资项目——特罗莫克铜矿项目因环境问题被当地政府叫停。此时距离秘鲁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仅仅3个月时间,高达3亿元的诉讼赔偿诉求和延产造成的收益减损,其损失程度巨大。

1.3 文明与宗教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之一是互联互通,从根本上讲是多元文化的融通。这既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需要深度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境界,也是古丝绸之路精神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创建,文化、宗教始终依托“一带一路”这一战略平台进行交流与传播。文明包含宗教与文化等要素,所以宗教风险一定程度上也是文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典型的地缘文明特征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几大文明断裂带。例如,中亚文明可细分为伊斯兰、汉蒙、斯拉夫、印度、佛教五大类。文明断裂带的存在给中国企业在沿线开展投资经营埋下宗教风险的隐患。

文明与宗教是国际投资中的柔性“软环境”,相比于政治、经济以明确的政策、条例营造的刚性“软环境”,则显得较为迂回和隐蔽,但又的确渗透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不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民族特征、语言文化等因素迥异,无疑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造成很大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与宗教风险大多通过引发国内教派冲突、煽动民

族情绪、极端恐怖袭击、域外文明渗透和国际负面舆论等方式表现出来。中国在南亚、中东和东盟等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将遭遇这类风险的冲击,如印巴冲突、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教派冲突、“伊斯兰国(ISIS)”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东地区能源开采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取暴恐袭击、柬埔寨政府基于煽动性民族主义情绪暂停中柬合作大坝项目等。

除此之外,域外势力对“一带一路”的文明渗透以及营造对中国的国际负面舆论,已成为桎梏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发展的隐形壁垒,亦不利于与沿线国家间“民心相通”的顺利实现^[2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若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仍保有较强的影响力。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全球霸权战略,将东盟、南亚次大陆、中亚及中东等地区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在文明与意识形态上,中国与越南、泰国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间日益失去曾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一边地”二级文化结构;相反,美国却日益通过宣扬其“个人自由、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的众多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一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深度影响着亚太地区^[25]。例如,二战后,美国文化逐步占据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主导地位,英语成为东南亚的主要语言,菲律宾甚至90%的报纸电视都使用英语。美国借“一带一路”宣扬“中国威胁论”,西方舆论则认为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建立新帝国,谋求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26]。在这样的情境下,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明渗透、对华负面舆论将会深深左右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27]。

以上的文明与宗教风险在信教人数高度集中,受西方文明渗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日益被放大的趋向——由文明与宗教风险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将给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带来负面冲击,不利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活动持续、安全、稳定的开展^[28]。

2 风险防范对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呈多样化、复杂化和长期性特点,因此,加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防范刻不容缓^[29]。我们从政府、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亟需采取的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2.1 政府层面

中国企业要稳健地“走出去”,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以促进相互间的经贸合作、产能合作与经济发展。第一,加强经济外交,增进战略互信。推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通过实际行动消除误会与分歧,并扎实推进双边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商签,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促进双边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第二,建立政府部门间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宏观协调。建议政府牵头创立协调、预警、应急、服务和磋商五大机制,强化其功能,保障中国海外公民安全、海上贸易安全以及原料供应和能源供应渠道畅通等。第三,建立健全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使境外企业投资行为有法可依。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海外投资法律,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与国际经济法、国际管理接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法规,以保障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2.2 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层面

为了减少和防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各种风险,必须防患于未然。第一,科学界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的条件,完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①建立和完善以国家为后盾、专业机构为主体、社会资本全面参与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体系,协助实施政府对外投资政策;②投保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海外市场开拓、战略和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外贸发展、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当然也应该符合东道国利益,做到互利共赢;③应把已经存在的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东道国合格的标准,奠定投资者遭遇政治风险损失后获东道国司法救济的法理基础。第二,加强行业协会的管理与监督,有效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桥头堡”作用^[30]。通过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机制,综合运用准入门槛、技术标准、质量监督与管理手段,规范和营造良好海外营商环境,规避行业失序,弥补政府在海外资产管理中的不足和替代政府的部分治理功能。第三,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智库,加强对直接投资东道国的调研。海外投资风险评估工作仅凭企业自身力量显然很难完成,建议加快设立中国对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调研^[31]。对投资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以便为投资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2.3 企业层面

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企业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加快中国跨国企业的大发展,不断提高境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企业要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品牌营销,加强境外企业间交流与合作,增强企业文化软实力,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在企业内宣传教育,注重员工激励和能力素质培养。第二,应该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提高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管理水平:①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以功能多元化、行业多元化及产品多元化来平衡损益,减少风险,提升效益。②严格项目审批,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避免盲目投资。③审慎运用并购方式。从国际经验看,并购特别是跨国并购成功率极低,中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品牌营销经验和核心竞争力,跨国并购风险更大。④实施“本土化战略”。面对各种风险,中国企业应入乡随俗,以期提高在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第三,构筑新型国际战略联盟。为抵御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宗教文明风险,构筑新型跨国战略联盟势在必行。通过采用引入国际私募或民营资本的方式,组成多元化融资和股权结构的战略联合体。战略联合体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建构战略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增强中国企业防范各类投资风险的综合能力。

3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地区合作新模式。这种合作新模式将带动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者和引领者,将始终秉承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的原则共同分享经贸投资过程中的改革发展红利。但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将会面临诸多风险,建议政府、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企业三方实现联动,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与互利多赢。

参考文献:

- [1] Yinwong C, Xingwang Q. The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9(3): 312 - 34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2018: 投资与新工业政策[R]. 日内瓦: 联合国, 2018: ix.
- [4]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2018 - 08 - 27.
- [5] 熊小奇. 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6] 陈波.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 *行政管理改革*, 2018(7): 61 - 66.
- [7] Zhou H. China, Secur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isk Management [C]// Arduino A, Gong X (eds).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gapore: Palgrave, 2018: 163 - 177.
- [8] 白永秀, 王颂吉.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背景与地缘战略[J]. *改革*, 2014(3): 64 - 73.
- [9] 王凡一.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前景与风险防范[J]. *经济纵横*, 2016(7): 33 - 36.
- [10] 唐鹏琪.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以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为例[J]. *南亚研究季刊*, 2015(2): 102 - 107.
- [11] 白远.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论[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 [12] 傅慧云. 2018 年亚洲新兴市场国经济预计增长 5.8% [EB/OL].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71219-820150>, 2017 - 12 - 19.
- [13] 中诚信国际. 2018 年一季度国际宏观经济分析 [EB/OL]. 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232810245_263888, 2018 - 05 - 24.
- [1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8 年度报告[M].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 [15] 观察者网综合.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基建投资缺口巨大需翻番, 除了中国 [EB/OL].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7_03_02_396760.shtml, 2017 - 03 - 02.
- [16] 迈克尔·皮尔. Asia's \$26tn infrastructure gap threatens growth, ADB warns [EB/OL]. FT 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578/ce?archive>, 2017 - 03 - 01.
- [17] 马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5(6): 189 - 203.
- [18] 智客. 投资“一带一路”还需注意汇率风险: “一带一路”国家汇率风险探索 [EB/OL]. 美篇, <https://www.meipian.cn/ps03y64>, 2017 - 08 - 08.
- [19] Haiyue L, Ivan D. Exchange rate and Chinese outward FDI [J]. *Applied Economics*, 2016(48): 4 961 - 4 976.
- [20] Kefei Y, Offiong H.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n industrial level analysi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4(3): 249 - 260.
- [21] 财经频道.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finance/20180921/u7ai8074379.html>, 2018 - 09 - 21.
- [22] Md. Nazirul Islam Sarker, Md. Altab Hossin, Yinxiao Hua, et al. Oil, gas and energy business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

(下转第 24 页)

- 问题,2003(5):36-40.
- [7] 赵乃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J].统计与决策,2005(24):59-60.
- [8] 张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选择[J].财政研究,2012(12):37-41.
- [9] 范飞龙.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2(11):36-39.
- [10] 郭国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统计研究,2008,25(9):54-56.
- [11] 陈漓高,张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地位划分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0):28-38.
- [12] 梁菁,李帮义.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产业选择[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1):148-149.
- [13] 赵春明,解亮品.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分析[J].新视野,2015(1):91-97.
- [14] 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38-41.
- [15] 王莉.美、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比较与我国的思路[J].经济纵横,2006(3):58-59.
- [16] 周国兰,周吉,季凯文.“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J].企业经济,2017(9):72-79.
- [17] 邢建国.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研究,1997(3):68-72.
- [18] 周新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J].国际经济合作,2007(3):34-37.
- [19] 雷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12(6):23-33.
- [20] 刘婷,陈瑛.中国ICT产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及时空演化[J].中国科技论坛,2016(5):149-153.
- [21] 毛凯丰.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资源基础条件研究[J].求索,2017(4):117-123.
- [22] 陈瑛,刘婷,杨晓霞.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产业的空间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31(11):1318-1321.
- [23] 石光.典型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启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2):1-10.
- [24] 葛振宇,湛泳.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亚太经济,2015(2):85-91.
- [25] 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102-104.
- [26] Liu X, Zou H. The impact of greenfield FDI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innovation in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8, 43(3):352-364.
- [27] 夏海钧.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1.
- [28] 刘慧.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评价[J].地理研究,2006,25(4):710-718.
- [29] Tobler W.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46(sup1):234-240.
- [30] 熊昌盛,韦仕川,栾乔林,等.基于Moran's I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空间差异研究[J].资源科学,2014,36(10):2066-2074.
- [31] 林锦耀,黎夏.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东莞市主体功能区划分[J].地理研究,2014,33(2):349-357.
- [32] 徐智邦,王中辉,周亮,等.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1):107-114.
- [33] Luc Anselin.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2):93-115.
- [34] 江娟,王疆.高科技人才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ICT行业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3-18.
- [35] 王疆,江娟.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J].世界地理研究,2017,26(4):20-30.
- [36] 吴琼.我国环境税的环保效应实证研究[D].合肥:安徽财经大学,2017.
- [37] Cheng L K, Ma Z.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Business Horizons, 2010, 51(6):485-491.
- [38] Buckley P J, Cross A R, Tan H, et al.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48(6):715-748.
- [39]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499-518.
- [40] Broadman H.G, Sun X.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World Economy, 2010, 20(3):339-361.

(上接第15页)

- gic context[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6):119-134.
- [23] 孙宏涛,衣红蕾.“走出去”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及其转移[EB/OL]. http://chsh.sinoins.com/2018-01/18/content_252947.htm, 2018-01-18.
- [24] Yiwei W. Dealing with the Risk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Deepak B. (eds) China's Global Rebalancing and the New Silk Road. Singapore: Springer, 2018:207-225.
- [25] 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读18届五中全会公报的五点思考[EB/OL]. <http://theory.rmlt.com.cn/2015/1104/407528.shtml>, 2015-11-04.
- [26] 王文.有关“一带一路”的负面信息被夸大[EB/OL].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10/7752559.html, 2015-10-14.
- [27] 苏娟.“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安全:挑战与应对[J].东南亚研究,2017(3):106-122,156-157.
- [28] 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J].世界宗教研究,2016(6):21-25.
- [29] 林芳竹,李孟刚,季自力.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 [30] 李峰.“一带一路”战略下行业协会的组织功能与作用探索——基于企业走出去的视角[J].理论与现代化,2016(4):16-21.
- [31] 刘作奎,陈思杨.“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与应对[J].国际经济评论,2017(2):28-35.